

# 布鲁诺·鲍威尔和 卡尔·马克思

鲍威尔对马克思思想的影响

[波] 兹维·罗森 著

王 瑾 等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布鲁诺·鲍威尔和卡尔·马克思

## 鲍威尔对马克思思想的影响

〔波〕兹维·罗森 著

王 谨 等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BRUNO BAUER AND  
KARL MARX**  
**THE INFLUENCE OF BRUNO BAUER  
ON MARX'S THOUGHT**  
by  
**ZVI ROSEN**  
MARTINUS NIJHOFF/THE HAGUE/1977

**布鲁诺·鲍威尔和卡尔·马克思**

**鲍威尔对马克思思想的影响**

〔波〕兹维·罗森著

王 谨 等 译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开本：850×1168毫米32开 印张：9.25

1984年8月第1版 1984年8月第1次印刷

字数：227,000 册数：6,600

统一书号：1011·91 定价：0.95元

**内 部 发 行**

80437

## 译者的话

《布鲁诺·鲍威尔和卡尔·马克思：鲍威尔对马克思思想的影响》是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于1977年发行的《社会史研究丛书》中的一本。该书不仅较系统地阐述了布·鲍威尔的生平、著作、观点及其对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影响，而且对当时的时代背景，特别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情况，也作了较全面的介绍。

研究鲍威尔，特别是研究鲍威尔对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影响，在国内尚是一个不多见的研究课题。作者与公认的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的研究方法相反，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在黑格尔之后，鲍威尔对马克思的影响要比费尔巴哈对马克思的影响大得多。这种看法能否站得住脚，那是另一个问题，但书中所提供的资料却大都比较珍贵，论述亦较系统，对我们了解、研究青年黑格尔派和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形成有一定的学术参考价值。

必须指出的是，尽管作者在总体上是肯定马克思的，但由于过份强调曾被马克思批得体无完肤的鲍威尔的作用，因而不仅常常流露出对鲍威尔的同情和辩护，而且在某些地方贬低了马克思（恩格斯有时也包括在内）对鲍威尔的批判。诸如此类的观点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也是我们需要批判地加以对待的。

作者兹维·罗森是波兰人，1925年出生在波兰的格但斯克，早年在华沙大学攻读哲学、历史和社会学，195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导师是拉扎克·克拉科夫斯基。罗森先后曾在华沙大学和弗罗茨瓦夫大学担任高级讲师，现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任教，专

门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德国哲学思想。为写此书，他先后到过许多国家搜集资料，最后在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完成了这一著作。

本书系三人合译。王谨译了第一部分的第二、五、六、七、八章和第二部分的全部；刘佩弦译了前言和第一部分的第一、三章；辛仲勤译了第一部分的第四、九章。全书最后由王谨统一校订。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们曾得到陈先达、熊子云等同志的很多帮助，谨在此表示谢意。由于译者水平所限，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1983年4月于北京

## 前 言

本书的目的是填补有关青年黑格尔派和马克思早期思想文献的一段空白。尽管过去几年来，流行的观点一直认为鲍威尔于德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曾在黑格尔青年门徒的激进活动中起过重要作用，但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本系统论述鲍威尔与马克思之间关系的著作问世。1927年，恩斯特·巴尼内科尔曾答应写一篇关于这一问题的专题论著，但并未兑现。

为了研究这一课题，我曾在许多图书馆查阅过资料。我要对下列机构的全体工作人员致以衷心的感谢：特拉维夫大学图书馆，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的图书馆和档案馆，海德堡大学图书馆，哥廷根大学图书馆，图宾根大学图书馆，法兰克福大学图书馆，马尔堡州立图书馆以及柏林国家档案馆珍本部。

我还要衷心感激特拉维夫大学和弗里茨基金会所给予的研究资助。正是由于他们所提供的经济支持，我才能拿出时间到国外去完成这一著作。我感谢莱塞克·科拉考斯基（牛津，万灵学院），厄热娜·弗莱施曼（巴黎大学与特拉维夫大学）和汉斯-约阿希姆·李伯尔（科隆）诸位，他们在同我的多次交谈中提供了许多有益的意见。我还要感谢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的H·P·哈斯蒂克，他把荷兰学者A·范登伯格·范艾辛加从事创作的住所供我使用，并使我有机会拜读了巴尼内科尔最近出版的论述鲍威尔一书的清样。我感谢在准备手稿过程中曾帮助过我的海娅·格莱；感谢帮我完成本书索引的C·B·蒂默。

最后我要特别向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特别是该所

的所长弗雷特兹·德扬·埃茨和C·B·蒂默致谢，因为只有在该所的赞助下本书才有可能出版。

兹维·罗森

# 目 录

前 言	( 1 )
-----	-------

## 第 一 部 分

### 作为青年黑格尔派的布鲁诺·鲍威尔

第一章 问题的提出	( 1 )
第二章 有关研究布鲁诺·鲍威尔的文献	( 6 )
第三章 施特劳斯《耶稣传》出版之前的鲍威尔的生平	( 19 )
第四章 黑格尔学派的分裂和青年黑格尔派的出现	( 23 )
第五章 作为神学家和施特劳斯批判者的布鲁诺·鲍威尔	( 42 )
第六章 鲍威尔对福音书的批判	( 53 )
第七章 作为黑格尔评注者的布鲁诺·鲍威尔	( 73 )
第八章 鲍威尔的宗教和历史观	( 101 )
第九章 鲍威尔的政治观	( 131 )

## 第 二 部 分

### 卡尔·马克思和布鲁诺·鲍威尔

第一章 鲍威尔与马克思的私人交往及文字方面的合作	( 151 )
第二章 马克思宗教概念中的鲍威尔的特色	( 159 )
第三章 鲍威尔对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影响	( 177 )



第四章	马克思异化概念中的鲍威尔的特色·····	(194)
第五章	鲍威尔对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的影响·····	(215)
第六章	马克思、费尔巴哈、鲍威尔·····	(242)
第七章	马克思与鲍威尔之间的论战·····	(268)

# 第一部分

## 作为青年黑格尔派的布鲁诺·鲍威尔

---

### 第一章 问题的提出

布鲁诺·鲍威尔（1809—1882），哲学家、学者和政论家。他写过几十本著作和数百篇论文，对宗教问题、特别是犹太教和基督教问题，对德国和法国史，对政治问题以及各种社会、哲学问题进行了论述。他是柏林青年黑格尔派公认的领袖，并且是全德文化知识界运动领导人之一。鲍威尔在1839到1843年期间从事过几年青年黑格尔派的激进活动。此后，由于普鲁士当局实行迫害、威胁和镇压的政策，这个运动开始分裂了。解雇大学讲师（鲍威尔本人被逐出波恩大学就是一例），封闭包括《莱茵报》（其最后一年马克思是该报的主编）在内的进步报纸，实行严厉粗暴的检查制度，所有这些都使德国各急进团体不可能提出他们的抗议和关于变革的要求。根据先反应后行动的原则，该运动内部的核心人物，开始对为实现他们的主要目标（即实行政府民主化，实行宗教和国家分离，废除特权）而应当遵循新的道路开展了一场争论。

对于他们当中那些倾向于社会主义的人，比如莫泽斯·赫斯和马克思来说，上述运动的原则和要求已失去意义，他们已找到实现其社会政治目标的更为急进的体系。这就是马克思反对鲍威

尔意识形态运动的基础。《论犹太人问题》、《神圣家庭》和《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三本有名的著作就反映了这一点。曾与马克思有过四年亲密友谊的鲍威尔在这些著作中被描述为最糟糕的虚无主义者；被说成是一个如果不从宗教或者从反宗教即无神论的立场搜罗证据，就不能解决任何政治、社会或哲学问题的神学家；被看作是完全脱离现实的思辨唯心主义者。

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的批判有时虽很严厉，然而总的来看还是中肯的。但于两年后（1845年）出版的《神圣家族》就具有两个特点：一是使用各种贬意的绰号，一是为了批判常常采取有选择地摘取鲍威尔概念的方法。马克思故意不理睬鲍威尔于1840至1843年期间所发表的观点，而只限于罗列鲍威尔在《文学总汇报》中所阐述的观点，并加以讽刺。这样，马克思就可以把鲍威尔的信念说成是“以漫画的形式自我再现出来的思辨”、“整个德国思辨的”谰言<sup>①</sup>、“重复了思辨的高见”和“思辨神学”<sup>②</sup>。

所有这些都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即鲍威尔的观点在内容上是空洞的、没有什么研究价值的，因为讨论脱离现实的思辨不会有什么意义。尽管有许多说法符合上述精神，但这并不是马克思的意图。恰恰相反，马克思认为，“在德国，对真正的人道主义说来，没有比唯灵论即思辨唯心主义更危险的敌人了。它用‘自我意识’即‘精神’代替现实的个体的人。”<sup>③</sup>

这里有一个明显的矛盾。一种“胡说”和仅仅只是“思辨的高见”的概念怎能危及马克思观点的地位并妨害它在德国的传播呢？二者必居其一：要么鲍威尔的观点象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但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7页。

② 同上书，第100—101、132页。

③ 同上书，第7页。

如那样的话，讨论这些问题就毫无意义，也没有必要把它们看作是“危险的敌人”了；要么情况不同于马克思的描述，假如这样的话，那马克思把鲍威尔概念统统说成是肤浅的、陈词滥调等等，显然或至少就是言过其实了。人们以前就注意到了这一矛盾，例如古斯塔夫·迈尔在其关于恩格斯传中就写道：“以其漫画形式，即以鲍威尔兄弟方式出现的思辨唯心主义，实质上并不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著作的共同序言中企图使别人相信的那样，是一个能危及‘真正人道主义’的敌人……。甚至夏洛滕堡的《文学总汇报》（该刊的文章曾引起过这种批评）也竭力与公众保持距离，而公众也几乎不需要这种报纸。”<sup>①</sup>

为了克服这一矛盾，迈尔从马克思自相矛盾的模棱两可的论据中，仅仅挑出关于鲍威尔哲学缺点方面的论点。但是问题并不这样简单，因为事实是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用了三百多页来反对布鲁诺·鲍威尔和与鲍威尔合作办报的一帮人。大家知道，马克思行文过长，对没有普遍重要意义的次要部分也详加论述，这使恩格斯感到震惊。但在他在他负责的那部分仅用了二十页；而且大家知道，恩格斯所写的虽然短小而却具有讽刺性的内容，把鲍威尔的真实面目完全公诸于众了<sup>②</sup>。

而且，认为鲍威尔的概念显得很肤浅的看法，同马克思自己前不久所写的关于鲍威尔的善良品质，特别是他作为作家和学者所具有的长处的许多说法是相矛盾的。只要稍微引证马克思的一些评价，就可以说明这一点。马克思曾说：“鲍威尔以其深刻的评论，证明了他们的（即神学家们的）无知”<sup>③</sup>；“所有这一

---

<sup>①</sup> 古斯塔夫·迈尔：《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传》，1934年德文版，第187—188页。

<sup>②</sup> 参看奥古斯特·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2卷，中文版，第310页。

<sup>③</sup> 卡尔·马克思：《格鲁培博士反对布鲁诺·鲍威尔》，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旧国际版，第1部分，第1卷，第1分册，第399页。

切，在风格上都非常泼辣、尖锐、机智、透彻，具有丰富的想像力和旺盛的斗志。”<sup>①</sup>

看来《神圣家族》中所反映出来的马克思对鲍威尔的态度——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远不是明确的——是复杂因果关系的结果，而且不能通过单一的因素去理解。

如果我们考虑到马克思必须投身于反对鲍威尔的消耗精力的论争才能摆脱他多年信守的思想这一事实的话，那么上述矛盾就可以理解了。没有任何人比马克思更清楚地知道，仅仅三年之前鲍威尔的思想对德国的知识分子是多么具有吸引力！

1842年8月，一个奥地利的秘密警察曾向政府密告：“许多人都拥有鲍威尔的书……更糟糕的是，他的思想渗透到教育界的心脏并成了它的重要组成部分。”<sup>②</sup>

因此鲍威尔思想很得人心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而且，实际上这种情况已成为传播和吸取马克思思想的障碍。但这是在马克思的论文出现以前的时期。当鲍威尔被免去了大学职务从波恩回到柏林的时候，这种危险就过去了。在鲍威尔免职以后随之而对福音书和基督教进行的批判<sup>③</sup>得不到广泛公众支持的情况下，鲍威尔显然陷入了巨大困境<sup>④</sup>；而在公众又持冷淡态度的很不协调的情况下——几家刊物如卢格的《德国年鉴》和某些报纸如《莱

---

① 《青年马克思论哲学和社会的著作选集》，德文版，第218页。

② 卡尔·格洛絮：《来自三月革命的秘密报告》，维也纳1912年版，第313页。

③ 参看布·鲍威尔：《微弱灵魂的自由》，德文版，第70—90页；赫尔茨-埃伊罗德博士：《三月革命中的青年黑格尔分子布鲁诺·鲍威尔》，柏林1957年版，第89页。

④ 参看布·鲍威尔：《自由的正义事业和我自己的事业》，德文版，第20—40、202—205页。

茵报》的抗议，并不能改变这种局面——鲍威尔的幻灭日益导致他批判群众的消极性和强调他所提倡的纯理论性质。在上述种种情况下，特别在先是恫吓后来又加以压制的气氛下，鲍威尔失去了对进步知识界的大部分魅力。这些人对他的依附也削弱了。因此，人们很难相信马克思在其总的评价中，指的是从1844年起鲍威尔所鼓吹的那些思想。马克思指的是鲍威尔思想的整个体系，这些思想的精神内容是丰富的，它们今后的复兴将使鲍威尔再度受到人们的重视。<sup>①</sup>

此外，马克思还想证明（也许首先是向他自己证明），在鲍威尔的概念和他自己的概念之间不再有任何共同之处。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之间已出现了一道鸿沟，因而他进行尖锐的批判，极力贬低鲍威尔及其著作，运用一些侮辱性的词句并对鲍威尔理论加以讽刺。马克思认为，这样不仅可以勾销他本人哲学上的往事，完全抛弃鲍威尔的基本上是批判的方法，而且可以竭力证明他本人的人道主义比他先前朋友的思想高明。

马克思反对鲍威尔的运动——为了确定这一运动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我们将在下文予以探讨——提出了以下几个问题：布鲁诺·鲍威尔是怎样一个人？他的观点和哲学路线是什么？鲍威尔和马克思之间的密切友谊是怎样产生的？他们两人最终为什么又会分道扬镳？

在探讨这些问题之前，我想先说一说有关鲍威尔现存的文献和学者们对待他的态度。

---

<sup>①</sup> 指出这一点也许是有兴趣的，即恩格斯最初曾认为通过一篇嘲笑鲍威尔的短文就可以置他于死地，但在马克思的影响下改变了想法，并在《新道德世界》中写道：“布鲁诺·鲍威尔和施蒂纳是唯一严重的共产主义的敌人。”（见迈尔：《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传》，德文版，第227页。）

## 第二章 有关研究布鲁诺·

### 鲍威尔的文献

要考察鲍威尔的观点并非是一件易事，这不仅因为他涉及的领域广泛，而且主要是因为他作为一个学者和新闻工作者所写的著作散布得太广。他的相当一部分论文是在发行有限的报刊上登载的，而这些报刊现在已难以找到。出版社印刷的其它一些著作，鉴于发行的数量很少（因为出版条令不利于出版商），也常常难以弄到。比如，鲍威尔的《基督教真相》一书在发行之前就遭到了禁止，只是在若干年后，即1927年，由于发现这本书的原文手稿的恩斯特·巴尼内科尔的努力才得以再版<sup>①</sup>。

另外还有三个原因无疑也影响了探讨鲍威尔的学者们的兴趣：

第一，鲍威尔完全为马克思所否定。马克思认为应把鲍威尔看作是黑格尔“绝对精神的瓦解过程”<sup>②</sup>的产物。这一看法首先影响了那些接受马克思的理论，从而也接受了马克思对鲍威尔极不尊重的，甚至是轻蔑评价的学者。其次在那些同马克思的武断态度没有什么联系的学者们中间，在那些甚至根本不同意马克思理论的学者们中间，也公认鲍威尔是一个靠黑格尔哲学的面包屑

---

① 参看恩斯特·巴尼内科尔：《三月革命中的〈基督教真相〉》，布·鲍威尔反对宗教和基督教战斗文献的第一版》，耶拿1927年版。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9页。

过活的模仿者和编纂者；其原因就在于他们的评价与马克思的评价一样，都对鲍威尔的著作缺乏直接的了解（实际上，这是决定性的因素，因为差不多所有的学者都是依据马克思同鲍威尔之间的争论来确定自己的看法的）。

第二，鲍威尔曾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持激进的和批判的观点，当时他作为青年黑格尔派的一员积极从事文学、新闻写作，研究基督教、黑格尔哲学和政治。而在参加激进运动之前，他却是一个正统的新教神学家，甚至担任过《思辨神学杂志》的编辑。青年黑格尔派瓦解后，他又成了一个保守主义者并同海尔曼·瓦盖纳密切合作了许多年。海尔曼·瓦盖纳是《国家与社会词典》和《十字报》的编辑，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反动分子和反犹太主义者。<sup>①</sup>

人们或许可以说，许多学者由于无知而不愿涉猎鲍威尔的哲学发展，因此鲍威尔在其间发展原先的思想并对推动德国精神生活作出重大贡献的那个激进阶段就被几乎完全忽视了。

第三，这一条虽同鲍威尔没有明显的关系，但却更具普遍性。人们习惯于认为青年黑格尔派的观点，即他们的概念、思想和思潮，在哲学发展中不是重要的一章；认为这些只应归入1848年3月革命以前的德国的新闻和政治范畴。

例如，勒维特针对青年黑格尔派就写过这样的话：“他们的作品都是些宣言、纲领，本身根本不是什么完整的东西，也没有什么重要内容。科学论证在他们的手中变成了耸人听闻的声明……凡是研究过他们作品的人都会发现，尽管他们的调子很高但

---

<sup>①</sup> 关于这一点，见恩斯特·巴尼内科尔：《布·鲍威尔：研究与资料》，阿森，范科克姆有限公司1972年版，第345—353页；尤尔根·格布哈特：《政治制度和人的存在》，载《纪念埃里克·沃格林纪念文集》，慕尼黑1962年版，第202—242页。



却使人感到枯燥乏味。他们用不适当的手段提出不合理的要求，把黑格尔的抽象辩证法变成一种雄辩术。”<sup>①</sup>

研究马克思早期哲学的文献虽然提到了鲍威尔，但也只是一笔带过，其原因很简单：在这类的研究中，重点都是探讨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 and 概念的演变；而鲍威尔只是被当作马克思生活中的一个短短的插曲而已。此外，某种图式已在马克思学中成为一种公认的东西，按照这类图式的解释，费尔巴哈对马克思在人类学、宗教批判、社会和国家学说方面的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这种流行的理论有许多夸大之处，我们将利用这一机会证明：鲍威尔对马克思思想的形成所起的作用被人们不适当地低估了。

那些专门探讨青年黑格尔派的研究文献虽给予鲍威尔一席之地，但就是在这一方面（特殊情况除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它们对鲍威尔思想所作的分析也远不能令人满意。斯图克说得对，他说：“尽管已有大量的论文、文章和详细的评论，但对鲍威尔的研究仍处于初步阶段。”<sup>②</sup>

假若认为人们对鲍威尔的评价都是否定性的，比如马克思对他的评价，那就错了。也还有其他许多评价。我们这里只想举几个例子。参加过青年黑格尔派运动并由于《历史学引论》一书（他在书中提出的实践问题<sup>③</sup>有点象马克思）而出名的奥古斯

---

① 卡尔·勒维特：《从黑格尔到尼采》，纽约，加登城，道布尔德有限公司1967年版，第64页。

② 霍斯特·斯图克：《行动哲学：青年黑格尔派对哲学实现的研究》（以下简称《行动哲学》），斯图加特，恩斯特·克莱特出版社1963年版，第127页。

③ 关于采什科夫斯基的实践问题，见尼古拉斯·洛贝科威兹：《理论和实践：从亚里士多德到马克思的概念史》，伦敦，圣母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193—206页；还见霍斯特·斯图克：《行动哲学》，第111—122页；什洛莫·阿维内纳：《卡尔·马克思的社会政治思想》，剑桥大学出版社1970年版，第124—218页。